

能改革,压实二级学院管理责任,赋予专业(群)负责人与其责任相匹配的权限,从而有效激发基层的改革活力。

三是实现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系统升级。当今时代,在数字经济的冲击之下,数字化转型成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重要挑战。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并非是一个偶然选择,而是新时代背景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不能适应这种挑战,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将很难回应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提出的整体要求,也很难把握数字化转型可能带来的新机遇。为此,需要围绕数字化转型要求,对职业教育作出系统变革。其一,紧扣科技发展对人才的新需求,优化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其二,构建职业教育数字学习资源库,实现职业院校教学内容的持续更新。其三,搭建职业教育智能应用场景,打造职业院校虚拟实训教学环境。其四,开发便于对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云平台,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描摹画像。其五,建立虚拟教研室体系,为职业院校教师专业化发展提供支撑。

四是构建科学的职教教师培养培训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教教师培养培训工作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总体而言,职教教师培养培训仍旧存在一系列问题,呈现出“应急发展”“应需发展”的基本特征,缺乏系统化的设计。为此,建议对于专业教师的培养,可通过升级改造现有职教师范生培养模式来实现,探索构建本硕连

读贯通培养“双师型”教师模式。建议对于文化课教师的培养,在进入岗位前,应积极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学习职业教育相关理论,了解职业院校的学校特点、教学特点、文化课定位、学生的学习基础与认知特点。建议对于职业院校专业实践指导教师的培养,原则上应主要从企业招聘,强调“工作经历优先而非学历优先”。

五是夯实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制度基础。无论是产业系统,还是职业教育系统,都是国家公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产教融合关乎国家命运,甚至影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长期以来,产业系统与职业教育系统之间的“两张皮”现象一直较为突出。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破解合而不融难题,需要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高度构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国家制度体系,既要关注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又要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具体而言,第一,要优化指向产教融合的管理制度,从根本上理顺产教融合所涉及的不同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改变管理条块分割、互不合作的局面。第二,要继续深化职业教育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职业教育产权保护制度。第三,要对企业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所产生的成本进行科学核算,并根据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程度进行等级评定,给予企业一定的公共技能培训补偿。

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改革,一体推进教育、科技、 人才三大强国建设

董刚



董刚

全国高等职业学校校长联席会议
主席,天津职业大学原校长,教
授,天津市首席督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两次提到教育强国建设,对教育强国的地位、作用、要求和目标任务均作出重

要论述,教育强国概念已从教育工作的价值愿景转变为极其重要的政策概念。党的二十大对职业教育重视程度之高前

所未有,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份量之重前所未有。在这一背景下,必须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大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水平。

一、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与科技体系、产业体系、社会体系对接

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经济政治化和大国博弈加剧。针对这一发展态势,党中央作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决策。因此,必须将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建设教育强国、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点,自觉成为新发展格局的内生变量和优先要素。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三教协同”,党中央强调“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就是要求职业教育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与科技体系、产业体系、社会体系对接,通过加强科研人才、工程人才、技术技能人才的协同培养,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因此,职业教育要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新发展格局,对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等值框架和职业教育的独立体系进行一体化设计,既解决职业教育自身的问题,又解决好教育体系整体结构性矛盾的问题。只有把职业教育真正办好了,才能解决好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平衡与协调问题,才能有效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实现教育结构整体优化、最终支撑教育强国战略。

二、构建特色科研工作体系,提升职业教育技术创新服务水平

技术创新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技术向商品的转化,这是技术创新最为关键的环节,是真正使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需要大批技术技能人才支撑。而从我国目前的人才结构来看,技术技能人才队伍特别是高级技术技能人才规模偏小,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职业教育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产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从这一点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显性标志就是“技术性”。然而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贡献尚未充分发挥出应有作用,原因有四:一是高职院校的科研工作定位不够准确,二是缺乏高水平的技术创新平台,三是校企融合、科教融汇、以研育人不够,四是开展技术研发服务

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因此,“高职院校应逐步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高墙”,立足于区域性、地方性特定的实际目标或应用目标,坚持科研服务地方的宗旨,紧密围绕区域产业需求,结合高职院校自身专业设置规划,借助和整合社会资源,逐步搭建对接专业建设、形式多样的科研平台,构建起具有高职院校特色的科研工作体系。

三、立足地方产业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增强职业教育与区域发展的适应性

我国经济开始由数量优先的发展模式步入质量优先的发展阶段。结合国际社会的经验,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增长,都将技术技能人才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通过产业产品的技术驱动倒逼创新,以此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从中国国情看,统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重大问题,要在统筹协调、缩小差距中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职业教育作为与地方经济结合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培养的是留得住、用得上的劳动力,更加适应地方产业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在促进地方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经济转型升级中具有重要价值。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应“加大职业教育制度创新、政策供给、投入力度”的工作要求,转化为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和自觉行动,高职教育也应立足坚持地方办学、服务地方发展这一宗旨,发挥“提高底部、普惠全民”的基础性作用和“应用导向、能力导向”的特色优势,切实提升职业教育服务区域发展战略的水平。

四、坚守公平、优质、多样,构建面向人人、终身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高品质生活”,要求顺应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适应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这也是新时代教育肩负的重大使命。教育是提升社会流动性、防止阶层固化、保持社会活力的重要途径,人们通过受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最终实现全面发展和高品质生活。

职业教育强调面向人人、面向实践、面向就业、面向终身,可以在促进多样化成才、改善生活品质、实现共同富裕上提供更多样、更高效的教育通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就必须坚守公平、优质、多样,必须服务全面发展、服务高品质生活,改变以精英教育为主导的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让每一个孩子获得公平的教育机

会,让每一个个体获得适合自身发展的教育,为所有人提供持续学习、不断发展的成长阶梯和畅通渠道,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服务人民高品质生活作出更大贡献。从这一点看,职业教育办好了,学生发展得好了,技术技能人才在整个社会阶层的流动性问题就解决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这本身就是对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传承,就是对能力社会、技能型社会的贡献。

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打造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多次强调将教育作为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内容,在重要国际会议上不断提出职业教育合作新举措。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职业教育列为重要内容,中国已是职业教育最大国,有基础、有能力为全世界贡献中国职教智慧,也有意愿、有义务在“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

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上贡献中国职教力量。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服务国际产能合作和中外人文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着力打造职业教育技能共同体,搭建职业教育数字共享平台,促进职业教育公平可及,以技能转型助力全球减贫,以技能合作支撑和推动经济增长,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推广“一带一路”倡议。

我国职业教育已经进入最好机遇期,但仍然充满着挑战,既需面临外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时刻紧绷“强国建设,教育何为,职教何为”的弦,还要应对教育自身发展的变化,从服务特定人群的固定阶段转向伴随每个人、面向每个人、发展每个人、助力每个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职业教育战线要用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努力把挑战转化成战略机遇、把战略机遇转化为发展优势,依靠自立自强,在守正创新中开辟出职业教育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之路,为教育强国建设助力。

重视高技能人才早期培养,加强教育强国服务能力建设

王新波



王新波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的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也是数代国人为之接续奋斗的百年梦想。据中国教科院课题组(见《教育研究》2023年第2期)测算,2012—2022年,中国教育强国指数排名由第49位上升到第23位,是全球进步最快的国家。中国教育强国建设在教育质量水平与服务能力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在高中阶段教育普及与完成、高等教育普及、高技能人才占比等方面还有明显

短板。特别是,“高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在10年间虽然从12.9%上升到19.6%,但排名不升反降,在125个参与测算的国家(地区)中,由103位降到106位。而测算中所用的比例是国际可比的宽口径值,实际上远高于国内通常所说的高技能人才占比。可见,我国能胜任高技能岗位的就业人员占比明显偏低,与公认的15个教育强国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明显,大大拉低了我国教育强国指数测算中“服务能